

【编者的话】

1922 年，英国人乔治·奥威尔来到彼时仍是英国殖民地的缅甸担任警察；二十多年后，他在小说《1984》中，描写了一个新闻审查已经深入骨髓，监视体系遍布各个角落，人们不自觉地配合新闻审查体系进行自我审查，甚至相互告密的极度扭曲的社会。他可能没有想到，这部



小说竟成为二十世纪后半页缅甸政治的最佳写照。

不过，事情在 90 年后发生了变化。2012 年 8 月 20 日上午，缅甸信息部发表声明，废除实行了 48 年的媒体审查制度，所有出版物在付印前均不再要求送新闻监察局审批，这被视为缅甸迈向言论自由的最重大举措，引起世界关注。

本期 1510 周刊中，丁力从缅甸历史上的审查制度谈起，他对缅甸的未来持乐观的态度，因为"在一个有自由表达权的国家，经济发展将更为均衡，贫富差距不会特别大，因此保持增长的动力。"而江玮则通过缅甸记者 Kyaw Thu 的个人经历向读者再现了缅甸媒体工作者在严苛的审查制度下的生存状况。

对于作为缅甸邻国的我们来说，媒体审查制度并不陌生。周刊的第二部分，《纽约时报》关于慕容雪村的报道讲述了这位屡次碰壁的作家利用网络影响力与审核制度抗争、并逐渐了解底线的故事。而通过林贤治的文章，读者可以看到苏联和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历史上出现过的地下出版物"萨米亚特"和地下作家们。林贤治写道："萨米亚特的出现是一件幸事，作家至少借此拯救了自己，并因此拯救了政治高压下的怯懦而愚昧的人群；但是又何其不幸，他们本来就该享受充沛的阳光，自由地、毫无顾忌地写作。"在一些统治者看来，开放媒体自由很可能威胁政权的稳固，而张鸣教授对清朝末期开放报禁期间的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事实上，媒体，包括革命党人居心叵测的报纸，如此作为，并没有撼动这个政府，反而帮助了政府整顿澄清吏治，使得政府官员行为大大收敛。"

审查的镣铐并不只来自政治权力，在长期接受审查之后作者的自我麻木，以及商业社会金钱至上的观念，往往构成了对媒体另一种隐性的审查。在周刊第三部分，我们选取了几篇文章探讨新闻自由面临的这些威胁。

许知远在《内在的审查》中表达了对自我审查机制的担忧："我们变成了一个勤奋的自我审查者，自我麻痹者。即使没有得到明确的警告，我们已经率先提醒自己——这个议题无法触碰，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可能变得热衷于在字里行间的小小文字游戏，沉湎于用双关、隐喻、联想来传递可怜的事实，长此以往，我们的所有兴奋都将集中于说出那一句常

识。”

而另一方面，台湾“旺中案”凸显出了当今盛行的商业逻辑对媒体公共精神的侵蚀。对此，张铁志提出了台湾新闻自由的三个重要支柱：媒体市场的公平竞争、记者的自主性以及公民力量。在周刊的最后，我们选取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富媒体穷民主》一书的导言，分析媒体如何在商业市场观念盛行的今天逐渐集中到少数联合公司手中，乃至走向民主的对立面。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 录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革】

8-1 丁力：缅甸又向前迈了一步

“在发展的某个阶段，一个国家必然发生重大变化，走向现代文明。如果改革不成，革命必然胜利。在革命的大势所趋中，上层革命与下层革命在赛跑，谁会跑赢将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未来数十年。”



缅甸的新自由

8 月 20 日，缅甸信息部宣布废除对所有本地出版物的审查制度。这是政府放宽对媒体控制的新的一步。解除审查从去年开始，以儿童读物、诗歌刊物的独立自主为起点，逐步推进。从 20 日起，“敏感的”政治和宗教刊物也不必再接受政府官员的审查，从而完成了出版物的独立。据过去的报道，审查机构也将撤销，但信息部的本次声明没有包含这方面的内容。

影视作品仍将继续接受审查。缅甸人还将在争取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道路上走下去。从目前的趋势看，废除对影视作品的审查将为期不远，持续 48 年的审查制度将要寿终正寝。

自 1962 年起，缅甸由军人实行统治。去年 3 月，吴登盛政府上台，缅甸开始民主化进程，数百名政治犯被释放，长期被软禁的昂山素季不仅能够自由地走出家门，还被补选为国会议员。吴登盛总统需要一个可控的民主化进程。这是必要的一步，得到了昂山素季等人的支持。







在长期的专制高压之下，民众的愤怒可能突然爆发，造成流血冲突；突然的解压也可能诱发动荡。执政者需要掌握释放压力的技巧。这是政权所有者的职责，因为压力是他们单方面施加的，利益是他们独吞的。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把责任推卸给百姓，让在高压下挣扎的百姓独力维持和谐和稳定。

缅甸审查制度的对象是独立的私营媒体。因为国家"媒体"不需要专门机构的审查。它们执行严格的自我审查。在那里，主编是官僚阶级的成员，他们的工作不是指导新闻报道，而是审查新闻，枪毙新闻。对于他们，最重要的不是知道该报道什么，而是知道不该报道什么。其中的极品干脆不报道新闻，只刊登空话、废话和假话，这些人反而更容易获得升迁。

缅甸的私营媒体还受到限制，如不许经营日报——国家"媒体"的禁脔。在放松审查的几个月中，私营媒体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其实，在军政府统治时期，缅甸已经有许多私营的媒体。但它们那时不是独立的，受到官府的严密监督——在正常国家，相反的情况才是正常的。独立于政权的媒体是自由表达的必要组成部分，监督政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缅甸独立媒体的独立性正在加强。据《纽约时报》21 日报道，有 800 个成员的缅甸新闻工作者协会在 8 月 11 日举办合法的大会。官员想要来看看他们在说什么，做什么。主办者却直接告诉他们不受欢迎："对不起，你们没有受到邀请——不要来。"在仰光的主办者还把这件让官员没有面子的事情里捅给外国媒体。这样的变化在一年多前还是无法想象的。

以废除审查为标志，缅甸正在一步步地走向一个开放的、文明的社会。改革没有回头路。吴登盛总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正处于迈向民主的正确道路上。因为我们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所以只能向前迈进。"他说："绝不走回头路。"这些话登在 20 日的《华盛顿邮报》上。

对自由的热爱是大多数人的天性，奴性大多是独裁者精心培养出来的。其实，独裁者也热爱自由，只不过他们的方式与普通人的不同。为了使自己的自由最大化，他们用暴力压制、消灭其他人的自由，甚至还想打破自然规律，长生不老。一些不赞同自由的人往往强调"自由是有限度的"。这话一点都不错，但更应该对独裁者说。权力必须是有限的。

媒体自由不是无边的，其限度由法律规定。但法律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有惩罚条款，也



必须有权利条款。法律不应是一家之言，甚至连一家之言都不公布，以便统治者随心所欲。对法律的解读常常有分歧，独裁者和他的仆人们更是拥有极大优势，可以任意解读法律条文，但他们还想要更大的自由。法律并不总是神圣的。法律的制定需要正义，法律的执行需要公正，否则必然沦为魔鬼的凶器。

军政府时期的缅甸有新闻法，非常粗略地规定了各种报道禁区和各种惩罚条文，为官员的随意解读留下很大空间。缅甸政府现在正在修改新闻法，但原来的条款还有效，可能成为媒体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把揭露真相的记者送进监狱。缅甸的表达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由的几个功用

自由从来不是孤立的，它是一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如上两段谈到的，自由还涉及到法律，而法律及其解读又受制于政治制度，民主和专制之下有不同的法学思想。

表达自由能够给一个国家带来很多好处。一些热爱自由的人们相信，自由是天赋权利，没有必要特意为自由作功利性的辩护。他们是对的，但还不够。以下谈到表达自由的一些形而下的用处。

一个国家的自由程度和富裕程度大致是等比例的，很少有例外。那些例外国家的规模都不大，能够从某一项得天独厚的资源中获益，如石油、港口，等等。这些国家还会面对一些严峻挑战，如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滞后、资源的枯竭或转移，等等。它们不能成为其他国家的借鉴模式。

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东半部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邻国中有陷入战乱的阿富汗、封闭和先军的朝鲜、军政府长期统治之下的缅甸。其他一些邻国较为安宁，但富裕国家很少。

8 月 20 日，在缅甸宣布废除出版审查的同一天，亚洲开发银行宣称这个国家将成为亚洲的





"明日之星"。该行预测，在 2030 年之前，缅甸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7%~8%，人均收入增加两倍，将基本摆脱贫困。缅甸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如果没有阻碍发展的政权，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理由维持长期贫穷。去年以来，西方国家逐步解除针对缅甸军政府的投资和贸易禁令，缅甸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经济完备。对比二战之后的东亚国家发展史，7%~8%的增长率预测可能有些保守——即使亚行假设缅甸新制度下的统计工作不会浮夸。

缅甸的未来将如何？没有人能够对历史作出准确预言，但历史有迹可循。在一个有自由表达权的国家，经济发展将更为均衡，贫富差距不会特别大，因此保持增长的动力。这是因为人们有权维护自己的利益，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将被揭发出来，不至于持续恶化到不可收拾。

经济发展离不开自由，但仅有挣钱的自由还不够。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公民的合法财产乃至生命都可以被轻易夺走。台湾地区在 1950 年代初有了较大的个人自由、干扰较少的地方选举和自治。这当然是相对而言，却能够满足经济起飞的条件，台湾政治的实质还是军事和特务统治。1988 年 1 月 1 日，蒋经国先生正式解除党禁、报禁。这个划时代变化发生在"苏东剧变"之前。

韩国的现代政治文明道路更为曲折。朴正熙在 1961 年发动政变，掌握国家大权。他在统治期间实行经济的改革开放，韩国经济高速增长，被誉为"汉江奇迹"。1979 年，朴正熙被他的情报部长枪杀。在 1980 年，发生了武力镇压学生抗议的"光州惨案"。进入 1990 年代，韩国的民主化缓慢前进并巩固下来。今年 8 月 20 日，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以压倒性的得票率（86.3%）当选为执政党新世界党的总统候选人。在今年底的大选中，她可能成为韩国第一位女总统。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中，大多数人可能得到比以前更好的前途，即使他（她）是前统治者的子女。

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济是在相对自由、具有一定的地方民主的制度中起飞，然后建立全国（地区）性的民主制度，它们的转变基本上是和平的。缅甸是首先出现全国性民主化进程，然后亚行作出了经济起飞的预测。中东地区又很不同，自由和繁荣都很缺乏，因此爆发了"阿拉伯之春"的抗议。在利比亚、叙利亚等国，抗议因为政府的暴力镇压而发展为起义，这些国家的未来最不确定。可见，自由化和民主化既没有固定的西方模式，也没有固定的东方模式。



在发展的某个阶段，一个国家必然发生重大变化，走向现代文明。如果改革不成，革命必然胜利。在革命的大势所趋中，上层革命与下层革命在赛跑，谁会跑赢将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未来数十年。

（丁力，《经济观察报》观察家部高级编辑。原文链接 http://www.eeo.com.cn/2012/0824/232496.shtml）

【返回目录】

8-2 江玮：缅甸记者 Kyaw Thu——我感到非常高兴

“审查委员会毫不留情地将那些敏感或者与政府政策不合的报道删除,‘审查人员把我们交上去的大部分稿件都否决了。我只好把图片放大，或者把选中的引文放大来填充版面。’”

“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因为新闻审查制度的存在，这个国家的记者就象是戴着镣铐在工作。现在他们终于可以自由表达观点。”生活在仰光的自由撰稿人 Kyaw Thu 对本报记者说。他所指的消息是，从本周开始，缅甸取消了新闻审查制度。

Kyaw Thu 的记者生涯始于 2004 年，在很长一段时间，他深受审查制度之苦。缅甸曾经是世界上对新闻管制最为严厉的国家之一。

向缅甸政府的审查委员会提交版面校曾经是缅甸所有媒体必须履行的义务。这个审查委员会由数十名政府官员组成，其中一部分来自从前的军政府成员。他们毫不犹豫地对违反审查政策和反对政府的报纸和记者进行惩罚。

1962 年通过的印刷和出版注册法、1975 年通过的国家保护法以及 2000 年通过的互联网法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新闻自由。在漫长的军政府统治时期，缅甸没有宪法，因此新闻和言论自由得不到宪法框架的保护。

当记者时，Kyaw Thu 负责的报道领域是能源和矿业。“在新政府上台之前，这被视为敏感议题。我的很多报道都被删减或者毙掉。”

他还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那段时间他颇感无奈。因为审查委员会毫不留情地将那些敏感或者与政府政策不合的报道删除，返回到他手里的版面经常面临内容不够的问题。“审查人员把我们交上去的大部分稿件都否决了。我只好把图片放大，或者把选中的引文放大来填充版面。”



“很多报道最终我们无法发表，审查制度浪费了我们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年秋天，Kyaw Thu 得到了牛津大学的一份奖学金，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篇关于缅甸新闻审查制度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对缅甸的 77 名记者进行了调查访问，并与多位缅甸媒体高层交流，试图回答两个问题：审查制度对新闻报道和报纸质量的影响，以及对缅甸私营媒体行业的影响。

虽然缅甸政府允许私人办报，但私营媒体还不被允许涉足日报，这在很大程度上皆是因为缅甸的审查制度。

Kyaw Thu 在他的论文中论述了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流程。按照要求，所有周报在付印前两三天必须向审查委员会提交三分之二的版面内容，其中不仅包括稿件，连图片、广告等内容也需要一并提交。如果一家报纸是周一出报，它必须在上周五提交版面。

审查人员通常需要两天时间来对版面进行仔细的检查，他们被赋予对违背审查规则的报道进行删减的权力。至于剩余三分之一的版面内容，它们通常包括最新的消息，这部分内容可以在付印前一天提交审查。

变化没有在一夜之间到来，但它在一点一滴的发生。2008 年 5 月，缅甸新宪法通过了全民公决。这部宪法明确规定，公众有自由表达和出版其信念和观点的权利。

虽然被赋予了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但此时的媒体还需要小心试探政府的底线。2010 年 11 月 13 日，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的软禁生涯结束。缅甸媒体纷纷报道此事，还有一些媒体把昂山素季的照片放在了头版。很快，包括《七天新闻》、《声音》、《人民时代》、《缅甸新闻周刊》、《缅甸邮报》等媒体遭遇了停刊整顿。

Kyaw Thu 说他开始感受到审查制度的放松发生在民选政府上台之后。2011 年 3 月 30 日，总统吴登盛领导的民选政府在首都内比都宣誓就职。在新政府执政三个月后，信息部宣布将取消对一些媒体的预先审查制度。

当时，缅甸近 400 份出版物被分成两类，一类关注娱乐、卫生、儿童、技术和体育新闻；另一类关注新闻、政治、宗教、商业、教育和犯罪。按照新的审查制度，第一类别的出版物将



不需要接受预先审查。

2011 年 8 月 19 日，昂山素季和吴登盛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举行会谈。第二天，缅甸国有的《新光报》刊发了一篇报道，并配有一张昂山素季和吴登盛在昂山素季父亲画像前合影的照片。

在此次历史性会晤之后，基于国家政治图景而变的审查制度开始进一步松动。昂山素季的名字如今在缅甸报章上随处可见。也正是在那次会晤后，缅甸新闻出版审查与注册局局长 Tint Swe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呼吁结束媒体审查制度。他说："新闻审查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和我们的邻国都不存在，因为这与民主实践不合，审查制度应该在不久被废除。"

一年后的 8 月 20 日，Tint Swe 在仰光亲自向一些媒体代表宣布了废除审查制度的决定。

（江玮：《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原文链接：http://www.21cbh.com/HTML/2012-8-23/xMNjUzXzUwMzcxMA.html。）

【返回目录】

【显】

8-3《纽约时报》：慕容雪村和“我们”的底线（译言网）

“唯一的实话是我们不能讲实话。唯一能容忍的观点是我们不能表达观点。”

在去年《人民文学》杂志社的颁奖典礼上，首次收获文学奖的小说家慕容雪村姗姗来迟，在他手里攥着一张纸，上面有他写好的一些极具煽动性的话。

那些话都是对审查制度所带来痛苦的沉思，他本打算在典礼上这样说：“中国的著作有精神错乱的迹象，这是部阉割过的作品，我就是个太监，在医生动刀前我就把自己给阉了。”

典礼组织者禁止他发表这样的言论。所以在台上，慕容雪村直到离开也没说一句话。他随后就将这篇演说稿传到网上，粉丝们争相阅读。他之前完成的三部畅销小说也都是这么做的。

慕容雪村的真名叫郝群，慕容只是他的笔名。因为对网络文学的敏锐直觉，37 岁的他就已经跻身过去十年中国最有名的作家行列。

他的作品充斥着不雅，暴力和妄想——在繁华的城市里，商人和官员狼狈为奸，行贿、争吵，酗酒，赌博和买春层出不穷。他是描写腐败的行家里手，而他的朋友则在晚宴上称他是色情写手。

他的书在中国最终得以出版也见证了这个产业从政府小心看管到市场化运行的转变。

但慕容雪村的散文不可避免地在审查前碰壁，尤其是当前执政党下定决心要维持稳定，所以尽管出版业正在逐渐变革，他的文章仍属“禁文”之列，慕容说在政府眼里他是名“文字罪犯”，在自己眼中他是个“懦夫”——整天忙于自我审查。他遭受的挫折使他成为对中国审查制度

最犀利的批评家。去年 11 月在北京发言遭 禁，3 个月后他在香港又发表了那篇演说。上周他在纽约亚洲协会上也谈论了这个问题。

慕容雪村的商业成功源自他知道如何磨炼他的才华以及网络上的粉丝基础。

他在博客和微博上谈论政治话题，在微博上他有接近 110 万粉丝。他用不同的笔名把他的作品分章节发布在网上。这种狄更斯风格的长篇连载吸引了读者的关注也促进了反馈交流。一旦书稿完成或接近完成，他会和出版社签约。删节的图书版本赚钱，但网上的版本更完整。

2004 年，隶属政府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称慕容雪村的首部流行小说是“网络时代的潮流”，并在《人民日报》（执政党的喉舌）网站上重新刊登，成都的地方政府谴责了这部小说。未删节版本的小说《成都，请将我遗忘》被汤姆林森翻译成英文（"Leave Me Alone: A Novel of Chengdu"），在 2008 年入围亚洲文学奖的评选。

“我发现确实很有趣，”他谈到网上写作时说，边说边从他 26 层高的北京公寓俯视西山。一丝坏笑在他男孩般的脸上显现，“随后，我意识到网上的作家和读者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进程并带来了新气象。”他说。

网络激发了中国出版业的变革，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出版社能发掘新天赋并买下版权，这些都促进了过去十年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统治者很长时间都和书籍有纷争，他们都宣扬官方思想和历史，销毁其他的。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 18 世纪乾隆的文字狱，现在也同样如此。

新的思想论域开始形成于 80 年代，余华，莫言和苏童对中国历史和农村社会进行批判性分析，王朔在写城市“顽主”文学。但直到 90 年代网络的兴起才拉开了新思潮的闸门。

年轻作家在网上讲述中国的繁荣年代。像榕树下，这个很有影响力的文学网站，聚集着安妮宝贝，宁财神和李寻欢（路金波的笔名，现在他是著名的出版商）等网络写手。近些年，网络上流行的小说体裁，书店里都已囊括：科幻小说，奇幻类，惊悚类，推理类，青春类，还有最赚钱的——儿童故事。



“网络创造了这一切，文学潮流在 2005 年之后呈上升势头，”企鹅出版集团（中国）总经理周海伦说。

出版的力量

现在出版的图书数量是建国以来最多的。据官方数据统计，在 2010 年，大概有 328,000 本书出版，是 2001 年图书出版量的两倍。

但政府仍使用着重要的控制手段，新闻出版总署监视着这个产业，控制着出版社的增长，去年，有 581 家出版社获准出版图书，仅仅比 2001 年增加了 19 家。它们都是国有企业，政府正在巩固它们。

那些数字没有捕捉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市场需求刺激了私人出版社的繁荣。他们或者和国有出版社合资经营，或者经常从他们那买 ISBN 编号，每本都需要买。名义上，这种尝试是非法的，但政府假装对其视而不见。今年，官方鼓励私人出版社参与合资经营，这意味着更严厉的监管并将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

至于审核制度，主编是最终的裁决者。他们知道稍有不慎就会激怒领导而丢掉工作。特殊题材像军事和宗教类的非小说图书需要经有关部门的特别审核。在这个行业里，“每个人心里都有阴影”，出版商路金波说。

六月，官方首先拿珠海出版社开刀，这是一家小型国有公司，突然就关门整顿了。因为珠海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吉米莱的回忆录，他是香港报纸发行人，曾遭到过中国领导人的斥责。

网络也不是一块完全自由的土壤，也存在网络监督。还有一些作家不愿提供全本，因为害怕盗版，慕容雪村因为这个原因，也没上传他的新书，那是一部关于传销的写实作品。

慕容说他已经放弃了两部小说，他认为都没有机会出版。其中一本叫《反革命》。

“检查制度最坏的影响是心理上的影响，当我写第一本书时，我不担心它是否会出版，所以

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写，在我出版了一些书后，我就受到检查制度的束缚了。比如我想到一个句子，但知道它最终会被删掉。这种自我审查的感觉太糟了。”

网络带来的启发

2008 年，慕容雪村和路金波曾因《原谅我红尘颠倒》这本书起过争执，这是一本关于腐化法律制度的小说。起因是路从珠海出版社买好 ISBN 编号后，跟慕容说他想缩减印数，因为书的内容太出格了。在一次采访中，路金波说慕容雪村是“40 岁以下年龄段中最棒的作家”，但他补充道，慕容有个问题：他的书写的过于黑暗了。

“他是孤独的虚无主义者，没有信仰”，路金波说。

慕容雪村的四部小说和一部新闻纪实作品都以近些年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为背景。他离开吉林农村老家来到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那里是法官，律师和警官的摇篮。所以这类人群在他的作品中刻画的尤其细致，随后他从成都来到深圳又去到广州，在不同的公司担任不同的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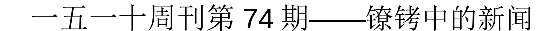
他兼职写作并投稿给杂志，但都石沉大海。偶然间他发现了一个内部网络论坛，属于广州的一家化妆品公司，他曾在那工作过。数以百计的公司员工都在上面发表文章，外部人员也能进入论坛。文学爱好者们在上面发表诗歌，短篇小说和系列小说。

他说：“我看见一个小说题目叫《我的北京》，这给了我灵感，我认为我也能写这类小说。”

2002 年，他开始撰写小说。笔名是“卖女孩的小火柴”，这参考了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但做了古怪的修改。他边写边把内容发到网上，这部小说内容粗俗但吸引眼球：主人公陈忠，在一家汽车汽油和配件公司上班，他经常行贿通奸，书中还有性的描写。

但网络的无拘无束让慕容感到震惊。发到 26 章后，他出了次长差。回来后发现有人已经写





好了第 27 章。“我被盗版了，”他无奈的笑道。现在这本书有两个版本了。

网上写作能在最大程度上脱离审查的监管。出版界与之不同，在他和周文（Zhou Wen）签约后，为了让小说得以出版，他不得不忍痛删去 10，000 多字。

但他另辟蹊径，在图书出版后，他将一部未删节的版本传到网上，比之前在网上一章一章连载的内容还要详尽。“这会让我如释重负，”他说。

有些作家对网上未审查图书的影响力持怀疑态度。《盛世》作者陈冠中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反乌托邦小说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但在大陆遭禁，陈冠中已经在网上看到至少两个电子版本。但他相信只有很少的大陆人会在网上读到这部小说，因为这本书在新闻媒体和其他任何媒介上都是禁止讨论的。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本书，所以他们也不会去网上搜相关内容。

慕容雪村最终说服另一家出版社发行了一部完整版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在中国，出版权通常有 3 到 5 年的有效期，出版社推出新版本时会比首版更有信心通过审核。

慕容雪村说：“一本书一旦审核通过并出版了，那它就是合法的，几年后，你就可以发行完整版了。从逻辑上讲：如果首版通过了审核，那再版怎么可能通不过呢？”

了解底线

他开始对第二本书的内容加以控制，这部《天堂向左，深圳向右》讲述了年轻人在深圳追求财富的故事。有了第一本书的出版经验，我已经知道底线在哪了。

举个例子，他起初曾想在书中加入某年那件事的描写，但他最终没敢触碰那条底线。

进行自我审查还有另一个原因，他说：“我总能和编辑们打成一片，所以我不希望给朋友们带来麻烦。如果他们认为有些话太敏感或他们会因此丢掉工作，我会让他们删掉那些“不合规矩”的句子。

和《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类似，《天堂向右，深圳向左》的完整版也放到了网上。他



的第四部小说是关于法制的，其未删节版将以电子书形式发售。

在完整版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主角是一个堕落律师，在死囚区被要求签字放弃自己的器官。

“既然我了解我的自我审查倾向，我在写作时就试图弥补这一点，”慕容雪村说，“我可以写一个版本然后发行另一个“干净些”的版本。”

但有时首版的内容就够让人惊讶了。慕容雪村的第三部小说《伊甸樱桃》，对中国享乐主义进行了批判，书中有描述暴发户在餐馆吃女人乳房喝处女血的场景。

在慕容雪村出名后，中国作家协会要求他加入，但遭到拒绝。与此同时，他开始了一项新工作，选择投身新闻业，这个行业的审查力度比小说更严格。

慕容雪村与审核制度最痛苦的一次抗争开始了，他的新作《中国，少了一味药》将由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讲述了他在传销网络潜伏 23 天的经历，为了让内容尽量保持完整，他和编辑陷入无休止的谈判中。在书中，甚至像“中国人”这样的字眼都必须改成“某些人。”慕容雪村朝编辑大发雷霆，把杯子摔得粉碎并猛击自己家的墙。

“就像有人在毫无理由地鞭笞我，”他说，“2008 年的时候，审查制度就很让人恼火了，但我还能忍受。但到了 2010 年，制度依旧没变，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张敬涛（Zhang Jingtao），那位和他吵架的编辑，说他希望“让这本书更适合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时代。”

张说：“出版业是一项文化活动，受制于意识形态，我的工作就是让价值观得到控制。”

这本书于去年出版，即便内容经过删减，仍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旨在提醒公安部门要注意传销诈骗。全书连载在《人民文学》（一本毛参与创办的杂志）上，杂志社编辑决定授予他该年度的文学奖。

去年 11 月颁奖典礼的前一天，慕容雪村花了 8 小时准备他的发言稿。他写道：“唯一的实话是我们不能讲实话。唯一能容忍的观点是我们不能表达观点。”整篇演讲稿多达 4000 字，但

最终，他在台上一字未说。

（译者：梦剧场球童。原作者 Edward Wong，《纽约时报》撰稿人。原文链接：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50498/230089/?bsh_bid=35247485）

【返回目录】



8-4 林贤治：萨米亚特——苏联东欧的地下出版物



“萨米亚特的出现是一件幸事，作家至少借此拯救了自己，并因此拯救了政治高压下的怯懦而愚昧的人群；但是又何其不幸，他们本来就该享受充沛的阳光，自由地、毫无顾忌地写作。”

地下出版是专制制度的产物

地下出版物产生于专制制度，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个地道的专制国度未必就有地下出版物。比如纳粹德国，一面焚书，一面迫害犹太作家，对人类文化的摧残不可谓不暴虐，但是，由于统治时间太短，而且整个国家一直处于战争的动荡之中，地下出版物未及出现。看来，地下出版也跟“地上”一样，需要一定的社会稳定性。

考出版史，19 世纪末欧洲的出版垄断及审查制度已经基本终结。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不料又有一批地下出版物，在苏联的政治高压下涌现而出。这批出版物最早以手抄本、打字稿和油印稿的形式，在知识分子的小范围内流传，后来由莫斯科、列宁格勒扩展到其他一些城市，具有广泛而有组织的活动的特征，并因此获得一个叫做“萨米亚特”的名称。萨米亚特，俄语的意思是“自发性刊物”。五十年代中期，“解冻文学”出现，六十年代形势严重倒退，开始镇压知识分子。1965 年，苏联两位年轻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尔因在西方发表小说而被捕，次年被送进劳改营，引发国内外的抗议。这一年，私人出版物明显多了起来，“萨米亚特”活动变得特别高涨，后来的许多持不同政见者，都曾出现在这起事件的抗议活动中。由此可见，萨米亚特表面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实自始至终都同现实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



也许是出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及萨米亚特的影响，也许是固有的体制的产物，至七十年代，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也出现了一批地下出版物，这样，萨米亚特一词随之进入这些苏联的"卫星国"，而且为西方所采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用语了。

萨米亚特在苏联

在苏联，萨米亚特开始仅限于文学作品，诗和小说最常见，后来从多少带点暧昧性的形式，逐渐变得暴露起来，涉及政治、宗教、思想领域，"颠覆性"愈加明显。以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例，帕斯捷尔纳克的著名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西方有多种译本而在国内被严禁出版，萨米亚特即根据从国外偷运入境的原文版进行翻印；索尔仁尼琴除了头一个中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因为赫鲁晓夫格外开恩而得到公开出版外，其他所有著作都由萨米亚特有计划地翻印。萨米亚特发表了不少叛逆诗人的作品，包括 33 岁死于劳改营的加兰斯科夫的诗集和通信集；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一线希望》最先也是出现在这上面，然后流出国外而获得巨大的声誉。

萨米亚特还致力于报道国内的政治事件，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比如关于精神病院、劳改营、克格勃、政治审判、书报审查、民族自治问题、人权问题等等。六七十年代，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以群体的形式登上舞台，萨米亚特成了他们的忠实而有力的伙伴。它定期出版"时事编年史"，提供相关的报道、评论、文件和摘要，这些内容一度成为国际社会了解苏联国内政治斗争情况的唯一的消息来源。此外，发表著名科学家、人权委员会创始人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萨哈罗夫的谈话、声明和著作，披露其他持不同政见者被迫害的消息；同时，还把西方传媒中有关索尔仁尼琴等一批流亡者的最新政见公布于世，打破苏联当局的新闻封锁。正是由于有了萨米亚特的源源不断的资料，《苏联人权编年史》才得以在美国定期出版。

所有这些地下出版物，都叫萨米亚特。许多最初由萨米亚特秘密送往国外的作品，后来又作为"违禁品"运回国内，在地下翻印传播，形成一种近于"回流"的现象。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专

政的国家，苏联当局当然不可能容忍这种地下出版活动，对此，克格勃采取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在严厉的打击下，萨米亚特的活动在 1975 年以后便渐趋式微了。

萨米亚特在东欧

此时，东欧国家的地下出版物几乎同时出现并迅速活跃起来。不同国家的作者互相影响，互相支持，常常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发生共振，仿佛存在着一个"萨米亚特共同体"。当捷克的《七七宪章》刚刚出现，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即刻表示支持；当"七七宪章派"遭到政府当局的拘捕和审讯时，他们又随即发起签名抗议，这其中许多都是萨米亚特的作者。

相比苏联，东欧国家的萨米亚特有一个多出的部分，就是反对苏联的殖民主义。当然，这部分内容与反抗原有的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不是没有关联的。从目前的介绍看，东欧私下出版的大型文学作品似不多见，主要是政治评论和思想随笔。哈维尔和米奇尼克是最好的例子，他们的文章后来有中译本出版，当然也是萨米亚特。迄今为止，我国介绍东欧萨米亚特的公开出版物，只有花城出版社近日出版的随笔集：《地下》。

在《地下》中可以看到，这些萨米亚特作者反对复制苏联类型的制度，南斯拉夫作家契斯公然表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化与文学的统一比在奥匈帝国君主政体下更加破碎。"在这一制度下，自由和民主的状况是他们最为关注，也是最感忧虑和愤慨的。匈牙利著名作家康拉德有一篇文章叫《民主的哲学》，谈到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其中有一段话极富启发的意义，他说："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不是齐头并进的；在任何既定社会里，可能一方正在进步而另一方却在趋于倒退。"在国家经济做出相当程度的改革开放而在政治方面仍然坚持封闭保守的时候，这种反差尤其明显。一个缺乏民主的社会，政治权力对法律的干预是必然发生的，所谓"法治"，只能说是一个空壳。克里玛把道德和法律，信任社会与法治社会联系起来考察，说："当一个犯罪的政权瓦解了法律的准则，当罪行受到鼓励，当一些高居于法律之上的人企图剥夺他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人们的道德就会深受影响。犯罪的政权知道这一点，试图通过

恐怖来维持合乎道德的行为，因为如果没有合乎道德的行为，就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甚至是这类强权统治的社会———能够正常运行。但是事实表明，一旦人们失去了道德行为的动机，恐怖也收效甚微。”又说：“一个建立在不诚实基础上的社会，一个将罪行看成正常行为的一部分而保持容忍的社会，即使这只是在一小部分特殊阶层之间；同时，这个社会又剥夺另一些人(无论这些人多么少)的尊严，甚至生存的权利，这样的社会注定要道德败坏，最终彻底崩溃。”捷克作家十分看重个人道德，《七七宪章》就是基于个体道德———包括责任感———之上的对政治的吁求。像这样把个人置于国家之上的观念意识，本来就是反东方(苏联)的，纯欧洲的。当时，他们力求让捷克“返回欧洲”，瓦楚利克写道：“个人比国家更重要，国家只不过是一个人为的、可以改变的人类发明，这就是人们之所以不断试图对它进行改革的原因。有一次，我告诉他们中的一个人：‘衡量公民自由的程度不是看国家如何对待那些赞同它的大多数人，而是，这样说吧，看国家如何看待那些反对它的极少数人’……在那些完全一致的地方，自由是不会产生的———哪里有不同意见，哪里才会有自由。”事实上，人们都习惯地把国家看成是固定的，由来如此的，看成巨大的偶像加以崇拜，于是，一种廉价的“爱国主义”由此得以产生，而且像传染病般在社会流行。

南斯拉夫流亡学者米哈耶罗夫把意识形态当做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苏联式的制度展开批判。他指出，许多“前共产主义者”在幻想破灭后没有把账算在“意识形态神话”上面，而是转移到俄国历史和民族性上面，这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格罗斯曼小说中的话说：西方的发展是由自由的成长造成的，而俄国的发展则是由奴隶制的成长造成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奴隶制将会超越俄国国境，把俄国发展的法则变成为全世界的法则。他还引用伯林科夫的话说：在那样的国度，从来不知道自由为何物，也从来不需要什么自由，俄国历史的主要使命总是努力扼杀自由。致命的是，俄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协助官方而尽种种努力。米哈耶罗夫指出：对极权的渴望，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第一推动力。由于极权政府实际上不可能控制精神世界，只好极力摧毁一切精神生活，再用虚构的东西去填补精神世界的空白。虽然，虚构的历史最终不能取代真实的历史，可是足以让人们放弃思考，导致精神奴役。他还使用雷达里赫创造的术语说，历史上奴隶制度限制了人的自由，而苏联则是历史上第一个“积极不自由”的社会，因为在苏联，不仅

要求人民顺从，而且还要人民积极参与它所编造的谎言和虚构。在《非意识形态的荒谬》一文中，他特别提出警惕"非意识形态"的问题。他指出，由于东方长期经受意识形态的极权教条主义的辖制，西方受到实用物质主义的影响，所以会出现"非意识形态"的迷误。其中，有人甚至断言：极权主义的伪精神信仰，单靠经济发展、消费社会的创建就可以轻易打破。许多知识分子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迷误，他为此引以为"不幸"，概而言之："缺乏一种新的、全面对抗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一个极权国家有没有可能自动蜕变为一个民主国家呢？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对此，历尽沧桑的幸存者作家克里玛解读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当权者的统治方式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他们可以控制、消灭个人和整个民族。只要这个方式存在，我们的世界就仍然会是一个恐怖的世界。"他以敏锐过人的洞察力指出："一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意决定谋杀的权力，即使它后来改变了其道德品行，试图忘记他们的过去，或否认他们的过去，这个犯罪的权力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威胁。"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由于克里玛对极权国家的本质有着如此清醒的认识，所以在《有权者与无权者》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与父辈仅仅关注贫穷、失业和饥饿等社会问题不同的是，我们这代人关注的是正义问题，是权力者将正义悬置的犯罪行为。但是，正如父辈处于经济萧条时感到个人的无助一样，我们这代人在面对极权主义国家的罪恶或凶残的暴政时，个人同样会陷于无助的绝望之中。

《地下》，是东欧多个国家的作家的一部选集，相当于一个合唱团，在多人轮唱中间，会有不同的调子，不同的声音，但那种如捷克作家塞梅契卡说的"捍卫自己的现实，以抗拒由政府和意识形态支持的现实"这一基调，在萨米亚特中则是一致的。是人的命运和世界的存在决定人的思想呢，还是人的思想决定人的命运和世界的存在呢？米哈耶罗夫肯定思想的决定性质，他指出萨米亚特存在的重要性，正在于思想和思想传播本身。



地下：写作与出版

在极权国家里，写作是一种充满禁忌和风险的事业，作家成为整个社会面临绝境的一个象征。苏联流亡学者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描述说："一个俄国作家如果不愿意按照国家的命令去写作，他就会处在一个地下作家所处的非常危险的噩梦般的境遇之中，面临各种粗暴的镇压和惩罚的措施。"诚如索尔仁尼琴说的："革命者是地下工作者不足奇怪，作家竟成了地下分子，这才是咄咄怪事。"不过，应当承认，在罗网密布、斧钺高悬的地方，只要有"地下作家"在活动，说明文学仍然是有希望的，因为它的创作者深具人类的良知和坚持的勇气。

当所有作家保持怯懦的缄默而不敢公开地说和写的时候，萨米亚特作家将写作转入地下，是其中最不自由的一群。他们必须随时警惕告密者、安全警察，提防抄家，把作品和将来适时发表的希望一起收藏起来。索尔仁尼琴自白说："我只有一个希望：怎样保住这些作品不被发现，与此同时也就保住了自己。"但是，由于他们决心与当局对抗到底而拒不公开发表，所以写作时也就毫无顾忌，恢复了精神的本源状态。对此，索尔仁尼琴深有体会，说："地下作家一个强有力的优越性在于他的笔是自由的：地下作家既不用想象书刊检查官，也不用想象编辑大人，他的面前除了材料没有他物，除了真理，再没有什么在他头上回荡。"事实和真理在地下写作中没有保密性可言，这些作品，相反表现出公开出版物所没有的开敞性、公开性。索尔仁尼琴的经验，在地下作家中是较为普遍的；他们都有一种风险意识，为了保持时代真实和思想自由，宁愿担受智慧的痛苦和行动的不自由。

地下写作不能等同于地下出版。写作可以收藏，而出版则必须流通。地下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可以称为"自由写作"，即在自由感支配下的写作，一种对抗性写作。这种对抗不自由的自由，永远存在于写作主体的精神体验之中。由于出版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并不具备写作的精神性，所以地下出版不能称为"自由出版"；至于有人称地下出版物为"自由出版物"，实质上是针对语境的不自由、公开出版物普遍的意识形态化，而就地下出版物自由的内在质性而言的。所以，无论在专制社会还是在民主社会里，所谓"写作自由"都是一个伪问题，"出版自由"才是真问题。



公开出版物的“地下性”

索尔仁尼琴根据个人经验，说地下作家是完全按照其特征选定作者的：他们是具备“政治上可靠而又能守口如瓶”这两种品质的人。即便如此，选择也未必可靠，而且圈子太小也限制了作品的影响力，东欧的萨米亚特作家就称他们的出版物为“自慰”。这样，一些在政治立场上与地下作家保持一致的作家，坚持选择公开出版的方式，但是在作品中明显地带进了一种“地下性”，使它们既不同于一般公开出版物的意识形态性，也不同于地下出版物的公开的反意识形态性，它们有着半隐蔽的特殊的式样和风格。

为使作品公开出版，就必须让它们通过审查制度，可以说，这是一场极其严酷的战争。康拉德说，在匈牙利，书报审查过程有三个级别：第一是自我审查，用鲁迅的话说，是自己先抽掉一根骨头；下一级是文化机构的审查，包括从编辑到党政官员的整个层面；最后还有政治警察，负责监视，并定期向上级汇报有关情况。在审查的层层关卡之前，作家不能不主动改变作品的形式和手法，其中最常见的有寓言、象征、隐喻、反讽、荒诞、影射等等，以保护实质性的思想内容不被删除。

到地下写作时，索尔仁尼琴曾经援引沙皇专制时代的老例，如普希金用“隐语”写出《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十章，恰达耶夫长期采用“密写”的方式写作等。至于索尔仁尼琴本人的表达方式则是完全袒露的，忠实于他的记忆而不容有所亵渎。但是，其他作家未必如此。就说扎米亚京，这位被党报点名为危险的颠覆分子的人，即使抨击现实政治，也不得不常常使用讽刺；他的著名小说《我们》，完全是寓言式的，把国家奴役设计为一个扼杀了个性和自由的集体主义城市乌托邦。虽然小说最后无法在国内出版，但是扎米亚京为此做过努力，还曾在一次作家会议上宣读过。

有文网，就有“钻网的法子”。在施予政治高压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地下性”的创造空间。在东欧，罗马尼亚作家米勒、马内阿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都带有一定的“地下性”，马内阿称为“密码式沟通方式”。在捷克作家中，从昆德拉，克里玛直到哈维尔，他们都有各自

的一套密码话语。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在歌功颂德之余，写了一个小说《魔鬼宫殿》，反专制的主题异常鲜明，因为采用了荒诞的、寓言式的手法，一时蒙混过关，得以发表，不过，出版之后不久就被当局列为禁书了。

“地下性”是一把双刃剑，一面可以破除审查制度的封杀，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因作者预计审查的威力而自行修饰、回避真实的意图，从而损伤自由思想的完整性及其反抗的锋芒。马内阿承认，他的作品由于使用“密码”，除了一些明显描写庸常生活的文字之外，其余部分只有最有经验的读者才能看懂。他有文章专论审查制度，称之为“文字的秘密警察”，“最可怕的权力武器之一”。他说，在极权社会里，没有一本具有独立品格的书可以通过警戒线出版，即使幸运出版，也是“替代品的版本”；至于他个人的已出版的书，则被他称作“残疾的儿子”。一百多年前，海涅如此写道：“那些思想的刽子手使我们成为罪犯。因为作者……经常犯杀婴罪：作者由于惧怕审查官而变得疯狂，杀死了自己思想的婴儿。”作者居然与海涅说的“思想的刽子手”———书报审查官成了“杀婴罪”的共谋，这是极其可怕的事。

无论萨米亚特作家表现出怎样的智慧和勇气，也无论他们取得了何等重要的思想和文学成就，都不能不承认，地下空间唯是专制时代的不自由的自由空间，它的存在是以人类创造力、心智和文化的惨重损失为代价的。萨米亚特的出现是一件幸事，作家至少借此拯救了自己，并因此拯救了政治高压下的怯懦而愚昧的人群；但是又何其不幸，他们本来就该享受充沛的阳光，自由地、毫无顾忌地写作。

“这是最后的斗争”———当年的苏联东欧正是在《国际歌》的悲壮的旋律中建立起号称人民的政权的，结果，思想回到了牢笼之内，在繁荣的出版物中出现了萨米亚特。正如一位萨米亚特作家所形容的，在普遍的顺从之间出现了“异议者”，这种非官方的精神权威与官方的世俗权威之间的对峙，构成了这些极权国家的“真正的戏剧”。这类戏剧，可以变换不同的剧目接连上演，直至柏林墙轰然坍塌仍迟迟不肯落幕。

（林贤治：作家，自由撰稿人。原文链接：

http://gcontent.oeeee.com/6/6e/66e06d5277b3189b/Blog/47b/2ca4f8.html） 【返回目录】

8-5 张鸣：清朝是被媒体毁掉的吗？

“事实上，媒体，包括革命党人居心叵测的报纸，如此作为，并没有撼动这个政府，反而帮助了政府整顿澄清吏治，使得政府官员行为大大收敛。”



关于清朝的灭亡，一个流行甚广的说法是，由于清政府没有加强媒体的管理，在新政期间，媒体总是发布有关政府的负面消息，做负面评论，清朝，实际上是被媒体搞垮的。类似的“结论”，有时也被用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上。在某些人看来，媒体即使不是旧政权倒台的元凶，至少也是一个有力的推手。

不错，武昌起义发生之后，全国多数的媒体，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革命党人办的媒体谎报战况，其他媒体也跟着起哄，报忧不报喜。但是，这场革命，却不是媒体鼓动起来的。起义发生的 1911 年初，武昌发生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媒体事件，大江报案。此案的发生，是由于这份具有革命党背景的小报，的确违反了清朝的报律，公开刊登鼓吹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文章。政府按律纠治，将主事人送上法庭，按道理，无可厚非。但尽管如此，这种政府整治媒体的行为，还是引起了全国舆论的一致不满，几乎所有的报纸（包括没有太多政治立场的报纸），都一边倒地声援大江报。而武昌当地的市民，也大多同情被关押审讯的两位报人。耐人寻味的是，报纸鼓吹暴力革命在先，并没有激起武昌新军中具有革命思想的士兵们的响应，而后来事情闹大，报纸遭到迫害，也没有引起士兵们的义愤，进而采取革命行动。随着两位报人詹大悲和何海鸣的锒铛入狱，案件居然平安结束。跟远在广州的革命党起义没有关系，跟后来的武昌起义也没有什么关系。



随着清政府开放报禁，革命党人回国办了很多报纸。在日本办的机关报民报，也能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国内，革命党人编印的反满小册子，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以及革命军，猛回头等等，也在一些学堂流传。但是，很快革命党就发现，单纯地办报鼓吹革命，影响甚微，不仅报纸很容易被查封，就人家不查封，也没什么销路。要想有影响，只能臭当局，多报负面新闻，就政府和政府官员的糗事，发布评论。这样一来，即使革命党的报纸，也跟当时销路甚广的申报，新闻报区别不大了。因为这种报纸，只要打探到政府和官员的不当或者贪腐行为，照例会一顿炮轰，穷追猛打，绝不轻饶。但革命党也只有这条路好走，只有这样，才能有销路。革命党人在北京办的国风报，一直惨淡经营，只有在抓住山西当局的文交惨案大做文章，才造出一点声势。

可是，事实上，媒体，包括革命党人居心叵测的报纸，如此作为，并没有撼动这个政府，反而帮助了政府整顿澄清吏治，使得政府官员行为大大收敛。权倾朝野的庆亲王奕劻的公子载振担任商部尚书，开会和同事叫了几个妓女，居然也被报出来，丢了官。这对于已经习惯了闲来无事逛胡同的京官而言，是一个多么大的震撼。原本，新政开始之时，清朝统治已经差不多 250 多年了，整个统治机构已经严重老化，吏治腐败，玩忽拖沓，已经病入膏肓。朝廷依靠这样的机器进行变法，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但是，由于新政是一种开放式的改革，在野的士绅和绅商凭借地方自治，咨议局的选举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的组织，高度参与。媒体又从旁批评，起到了监督作用。结果意外地吏治竟然有了大幅度的改变，更新谈不上，但至少作恶收敛了许多。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列举的官员劣迹，其实到了新政时期，已经大有改观。况且，除了革命党办的少数报纸（销路和影响都有限），当时主流媒体所主张的价值，比如立宪，文明等等，在改革中的清政府其实一直在努力向这方面靠拢。包括原本作为清朝统治象征的辫子，如果报纸抨击说留辫子不易于卫生，一些政府官员都会很听得进去，对剪辫子的下属，听之任之。

现在史学界已经承认，新政时期的成绩还是很可观的。不仅政府的军事改革，行政改革，司法改革和政治改革在有序地进行，而且在关税和盐税都抵押支付庚子赔款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居然能从不足一个亿，达到近三亿两。多数的省份，都有结余。投资增加，新的企业



接连兴办。社会秩序也比庚子义和团时期，好了不知有多少倍。1950 年代史学界统计辛亥前一年全国的民变，说是有一万起，但资料罗列出来的不过几百起。即使后来发生了革命，民众也基本上没有参与，说明他们对当时的政府并不反感，即使在革命发生的权力真空时期，也没有发生大规模地杀官事件（这在以往的朝代更迭中，是常见的）。这一切，跟媒体的批评监督，不无关系。他们的批评，即使具有相当恶意，甚至居心叵测的攻击，也在事实上给政府加了分。

我们知道，革命党人一直在搞起义暗杀，但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机会，真正有了机会，还是因为清政府自己犯了重大的错误，盲目而且专横地收揽权力，直至出台皇族内阁，专横地收揽资源，把地方的路矿权收归中央，也就是由皇权独揽。这样的大错一旦铸成，得罪了最不敢得罪的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革命就有了机会。这个过程，媒体其实一直在做事实上的诤友，对这样的倒行逆施大加挞伐，可惜，当时当家的满人亲贵，听不进去。打到清政府的，其实是这个政府自己。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dud6.html）

【返回目录】



【隐】

8-6 许知远：内在的审查



“比起外在的束缚，更重要的是，人们缺乏对内在自由的真正渴望。”

一

“如果你直接批评政府，会被关进监狱吗？”在学院的餐厅午餐时，我偶尔会被这样问道。剑桥的克莱尔堂里穿梭着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群，人们相逢，又匆匆离去，表达着对别人短暂和浅薄的兴趣。

当坐在对面或旁边的人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时，除去感叹中国的经济增长外，就会对我的人身安全感兴趣。中国是两个截然不同形象的混合体，它是繁荣、也是禁锢的象征。尤其是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可能只有朝鲜、古巴、缅甸等为数不多的国家比它更糟糕，甚至俄罗斯都更好些。

我该怎么向这些陌生人解释呢？一切没有他们想象得那样危险，但仍旧很危险。除去那些头脑最愚钝、心肝最麻木的人，没人不知道这是个专制、腐败甚至可以说邪恶的政权。但是，中国也不再是一个彻底的极权体制，你不必担心因私下的言论而获罪。事实上，从官员、商

人、知识分子到出租车司机，他们在餐桌上、闲谈时咒骂、讥讽现行体制，已经变成了一项娱乐。

你在公共空间上，很难看到、听到这种不满，到处是国家富强、和谐社会的赞歌。人们生活在一个二元世界里。这二元世界又加剧了虚伪与嘲讽的蔓延。中国似乎进入这样一种状态，人们都感到目前的政治体制问题重重。人们表示不满、充满讥笑，却又很少人准备真的改变它。似乎嘲讽已经产生了足够的满足。在嘲讽中，人们自认已经改变了现实。整个国家已经陷入了犬儒主义的泥淖。

犬儒主义的盛行，是因为现实的困境不能被传达到公共空间，私下的议论无法转化成公开表达的辩论，缺乏社会组织来将不满转化成正常的行动。这种公开性、组织性，正是一个专制政权最恐惧的力量，它将不惜一切代价来压制它们的出现与存在。彻底的极权主义，会试图改造人的思想，甚至连私下的念头都要压制。而现在，政权给予以私下抱怨的自由，政权甚至会容纳、鼓励这蔓延的嘲讽，但千万记住，这只是私下的游戏。

但另一个同样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原因是，人们缺乏足够的内心力量去追求自己的主张，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主张是什么。比起外在的束缚，更重要的是，人们缺乏对内在自由的真正渴望。自由很少被视作生活的目的所在，它似乎仅仅是一种手段。当自由只是一种手段时，它也就经常被交易。政权轻易收买了大学、媒体，让知识分子们用灵魂来交换物质生活。此刻的中国最大的危机是这种内在价值观的坍塌，或者说我们从未建立起这种内心的价值系统。

新闻记者是将真实生活的困境转化成公共讨论的传递者，是把被遮蔽与忽略的事实，呈现在公共空间的人。双重危机阻碍着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受到来自政治权力的威胁，很多议题是明确不能报道的，即使你报道了，你必然会被删除，你的个人可能也会遭遇不公对待，因为所有的媒体仍处于国家的监控之下。另一方面，我们变成了一个勤奋的自我审查者，自我麻痹者。即使没有得到明确的警告，我们已经率先提醒自己——这个议题无法触碰，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可能变得热衷于在字里行间的小小文字游戏，沉湎于用双关、隐喻、联想来传递可怜的事实，长此以往，我们的所有兴奋都将集中于说出那一句常识。



我想不出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但是在所有黑暗的历史时刻、所有专制的地区，说出真相、追求自由，都要付出对应的代价，都需要很多人为此而做出牺牲，是一颗颗自由心灵的相互鼓舞，是一代代人的持续的努力，才让自由得以实现。这些鼓舞也经常来自另一个地区与时代。

二

“那么，你是写两个版本，还是只写一个?”米克洛斯•哈拉兹蒂问道。我们坐在维也纳市中心的一家闹哄哄、烟雾腾腾的餐厅里。虚伪的健康崇拜还没蔓延至此，很多人兴致勃勃地谈天、喝酒、大口抽烟。

餐桌中间摆着《天鹅绒监狱》，米克洛斯•哈拉兹蒂的一本旧作。一本薄薄的书，算上前言与作者简介，也只有 163 页。原书的封皮已经丢失，只剩下是红色绒布面硬壳，上面印有烫金的作者签名，潦草、有力，似乎表明作者曾是个不羁的诗人。

这本书有关匈牙利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在米克洛斯写下这些文字的 1970 年代末，匈牙利模式正大获全胜。匈牙利政府在 1960 年代中引入了市场经济，并放松了社会管制，它和普通人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给你更好的物质生活，你放弃对政权的挑战。共产主义的体制并未改变，但比起仍旧严酷的东欧国家，匈牙利象是个天堂，它更富有、也更自由，人们说它是“牛肉汤共产主义”。

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某种新的空间，但是一种新的危险也随之到来。艺术家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和现有政治权力不仅达成妥协，甚至变成了相互依赖。监狱的冰冷栏杆被套上了天鹅绒，人们忘记了它仍是监狱。

我在剑桥的一间小图书馆意外的发现了它。最初，我很不适应它的风格，通篇是陈述句，没有疑问，到处是斩钉截铁的判断。它也很少引用，除去提到了一次约翰•弥尔顿，似乎再没有引用过任何人的话，似乎它是从真空中跳出的。但它散发着一股奇特的魅力，似乎面纱被有力的撕开，污浊遭遇了强力去污剂，在不容置疑的口气的帮助下，混沌重又变得明澈。它似乎不

是为了 30 年前的匈牙利，也是为此刻的中国而写。

我辨认出那么多中国社会的景象：艺术家们、知识分子集结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获取社会认同与现实利益。传统的审查制度消失了，很少再看到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直面抗争，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展览和发表，主动放弃了那一类的尝试。这令我愤慨，不止一次谈论他们的放弃。

但当米克洛斯直接询问我时，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个自觉的自我审查者，我从未写过两个版本的文章，一个为我的编辑，另一个仅仅为我自己。我可以指责中国现行体制的严酷性，但这不意味着你不能创造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暂时隐藏起来，但它是一个作家对世界和自己更诚实的认识。

我从未有过地下写作的经历。我写下的所有东西，几乎都被发表。即使经常表现出的尖锐，都含有某种特定技巧。在批评政权时，我知道分寸在哪里，或者自认为知道。最好不要直接提到领导人的名字，不对他们做出具体、细微的批评。用执政党、政府、社会这些整体而模糊的词汇，作为批评的对象。自我审查的机制不仅来自于政治权力带来的恐惧，也来自于市场空间。我不能被市场遗忘，我要谈论公众感兴趣的问题，似乎积累起越多别人的注意，我自身的价值也随之提升。无形中，世界的一部分被遮蔽了，因为习惯了不去谈论它们，它们甚至开始变得不存在了。而对于另一些人，这些禁区则强烈地吸引着他们去探索，以至于除去禁区，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想谈论。他们变成了另一种自我审查者。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与海外的异议人士，不正是这两个不同极端的自我审查者吗?他们经常相互指责，却使用了同样的方法。他们被缓慢地侵蚀，逐渐丢失了自己。

二十年前，柏林墙的倒塌，意识形态的争端告一段落。它似乎也让“自由”、“专制”、“审查”这些名词过时，它们不是属于那个已经塌陷的共产主义社会吗?而昔日的异议者们，则被人遗忘。但中国的崛起，则让他们的论述变得再次重要。

（许知远：作家，《商业周刊》执行主编。原文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578）

【返回目录】



8-7 张铁志：台湾新闻自由的挑战



“这个还没落幕的旺中事件，正说明了台湾新闻自由的三个重要支柱：其一是国家虽然不能干预媒体内容，但其管制机构必须要避免特定媒体成为托拉斯，保障媒体市场公平竞争，以及公众意见不必受单一企业箝制；其二、记者在媒体内部必须能集体捍卫新闻专业的自主性，不受老板影响；其三，公民力量必须能监督与抗衡媒体的不当报导，不要让少数媒体支配我们理解世界的途径。”

这可能是台湾解严后最大的一场媒体风暴。

你很难想象一个媒体集团会动用如此庞大的资源（报纸和电视新闻的大篇幅报导）来追杀一个学者，一个学生——尤其，新闻内容是极其荒诞的。

2008 年旺旺食品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先生买下原被视为自由派报纸的中国时报媒体集团（还包括原来中时底下中天电视、中视等电视频道），就屡屡引起巨大争议：由于旺旺集团在大陆庞大的事业使“旺旺中时媒体集团”（以下简称旺中）在两岸议题和大陆新闻的报导上自我限制；而面对外界的几次质疑，旺中集团都把媒体当做回应甚至反击对方的工具。

此次事件是肇因于旺中集团要并购另一媒体业者中嘉，许多学者因为担忧此合并案将使旺中成为台湾媒体市场独大声音、危害言论市场的多元性，因此反对。今年初更发起学界拒写中国时报运动。NCC（国家传播通讯委员会）在七月中审查此案之日，十几名学者前往抗议。没想到第二天，中国时报以头版和二版指控带头的中研院法律所学者黄国昌发钱动员学生来抗议，并且大幅刊登该名学者在路边抽烟、乱丢菸蒂的数张照片。事实上该报纸毫无证据发钱行为和黄国昌有任何关系，而以二版刊登抽烟照片更证明其目的只是在于打击反对者形象。



几天后网民制作了电视画面的截图，照片里被动员的学生群中有名男子是时报周刊副总编辑，怀疑这可能是旺中集团自导自演，一名清华大学学生在脸书上转贴该图片，旺中竟在电视上连续数天猛烈批评该名学生，并扬言要告他毁谤。

这些对学者与学生近乎疯狂的追杀引起社会强烈反弹，许多公民团体和知名人士发起拒看旺中运动，并且前往中天电视抗议，许多知名作家则展开罢写。

讽刺的是，刚过去的七月十五日是台湾解严二十五周年纪念；二十五年前的解除戒严，开启政治自由化，让报禁和党禁得以被打破，媒体市场可以有不必独尊官方的言论。但进入九零年代，一方面商业逻辑迅速吞噬了媒体的公共精神（这不只是因为香港媒体来台湾后带来的八卦风格，电视新闻本身也日益民粹化与娱乐化），另方面本地媒体沿着蓝绿分裂的党派化则损坏其中立性与公信力。台湾的媒体并没有在民主化后，成为一个丰盛、自主的公共领域。

旺旺买下中时集团之后，又让人见到媒体的自我阉割；这一次因为担心其合并中嘉的利益遭到阻碍而猛烈追杀学者，更让证实许多人原本的担心——旺中合并案通过后会限缩台湾言论自由的空间。在公民团体的反对之外，也有人开始讨论为报社写下或者播报那些攻击性新闻的记者，能否抵抗报老板或总编辑的压力，不成为报社的打手；或者，报社内部能否产生集体行动去捍卫编辑部的自主权。

社会的多元价值不仅有赖媒体环境的自由，还必须确保媒体市场的多样性。这个还没落幕的旺中事件，正说明了台湾新闻自由的三个重要支柱：其一是国家虽然不能干预媒体内容，但其管制机构必须要避免特定媒体成为托拉斯，保障媒体市场公平竞争，以及公众意见不必受单一企业箝制；其二、记者在媒体内部必须能集体捍卫新闻专业的自主性，不受老板影响；其三，公民力量必须能监督与抗衡媒体的不当报导，不要让少数媒体支配我们理解世界的途径。

希望这次事件可以成为媒体改革的契机。

（张铁志：台湾作家、乐评人。原文链接：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90-39294.shtml）

【返回目录】





8-8 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媒体与民主的悖论

“媒体已经成为一股明显的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力量，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它甚至蔓延到全世界。联合性媒体越富有、影响力越大，参与性民主的前景就越是黯淡。”



我们这个时代是建立在大量自相矛盾的事物基础之上的。一方面，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让人眼花缭乱，通讯与经济和文化缠绕在一起，因此，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在信息网络的最顶端是少数巨型媒介公司——不管从哪个方面看，这些大公司现有的规模都超过了 15 年前规模最大的公司——它们建立起全球性帝国，通过向全世界人民提供新闻和娱乐节目赚取了大量的财富。由于独立于政府的控制之外，这些商业媒体的巨大魔力为受众提供了 前人难以想象的选择机会，而且它还在不断地寻找受众。调查研究发现，1998 年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天消费媒体的时间为 11．8 小时，比三年前上升了 13 个百分点。正如调查者所言：“平均每个美国成年人消费的媒体产品和信息的绝对量正在稳步上升。”互联网的出现更强化了这一发展趋势。虽然有些研究认为，互联网正在取代人们花费在其他媒体上的时间，但是，另有一些研究持相反的观点，它们认为，互联网更加重要的影响只是扩大了媒体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人们正在花费更多的时间消费媒体，”一位媒体管理者说，“人们在消费媒体的时候并没有‘丢了西瓜拣起芝麻’。”

另一方面，政治疏离(depoliticized)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又一趋势，公民的传统政治参与观念已经变得非常淡薄，他们对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基本理解力也在下降。美国各种选举投票率——尽管不是一个完美的标准——在过去的 30 年中急剧下降。1998 年的国会选举是美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最低投票率之一，在投票日那天，只有三分之一的合法选民去了投票站。套用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man)的话，这叫“没有公民的民主”。



根据传统的理论，公民远离政治事务是十分荒谬的。商业市场观念的盛行——不受政府审查和规制——应当能够形成最有魅力的民主政治文化，但是，结果却并非如此。“人民”明显地对政治或公民问题不感兴趣，因为如果他们感兴趣，这正好有利于那些大的媒介公司的利益，它们就会向公众提供这方面的节目。因此，政治文化的衰落与市场观念关系不大，问题出在其他地方。上述现象的发生还与一个客观因素有关，但是，它却不能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实际上，商业媒介体系之所以享有特权地位——当然，许多政策是由媒体拥有者自己制定的——是因为从理论上讲媒体在民主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为培养公民素质和参与意识提供了制度性基础。如果民主是一个没有公民的制度，媒介体系应当负很大责任。

在本书中，我认为，媒体已经成为一股明显的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力量，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它甚至蔓延到全世界。联合性媒体越富有、影响力越大，参与性民主的前景就越是黯淡。当然，我并不认为所有的媒体都在变得越来越富有，事实上，在这个甚嚣尘上的时代，有些媒体正在苦苦支撑，有些媒体前景堪忧。但是，总体而言，那些主导性媒介公司与过去相比其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盛，大众化媒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与过去相比，显得更加重要了。我不认为媒体是使民主衰落的惟一或主要的原因，但是，它们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且与其他导致民主衰落的很多因素联系紧密。在新科技光芒夺目、电子术语晦涩难懂的背后，媒介体系已经逐渐集中到少数联合公司手中。这种集中强调追逐利润、媒介体系支持广告的核心趋势：惟利是图、玷污新闻和公共机构的正统精神。对民主而言，这是一剂毒药。

主衰落与媒体财富剧增两者本身并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事情。媒介体系通过所有权和主导经济的广告业，甚至与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得更加紧密。虽然资本主义从规范的民主制度中受益，但是，当精英掌控决策、大多数人趋向政治疏离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这种非民主体制下运行反而效果最佳。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媒体已经善于制作适应社会需要的节目种类，维持自己永久的社会地位。在我看来，如果我们重视民主问题，那么重建媒介体系就显得很 有必要，因为重建之后的媒介体系将把公民大众重新连接起来，他们才是民主的真正组成部分。我在书中构想的媒体改革是否能够成立，取决于这样一个条件：媒体改革必须通过广泛的政治运动来推进，运动的目的是将权力从少数人手中转移到多数人那里。这方面的任何努力(美国或者其他

国家的民主化)必须使媒体改革成为民主化的一部分(尽管不是绝对的)。但是，迄今为止，这一切还没有发生。

这本书是关于联合媒体的爆炸式发展与公共生活的逐渐萎缩、富媒体一穷民主的悖论式命题。目的是通过回顾历史、指出未来的民主变化来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同时，书还直接批评那些保守主义者，他们以目前盛行的所谓人类灵光智慧来为少数人利益辩护。在其他观点受到质疑之后，保守主义者最终得出结论，社会发展已经达到最完美的境界，所以，任何企图想改变社会现状的想法都是荒唐可笑、不切实际的。保守主义者的这个自文明的 破晓时分起就被统治的精英们所掌控，但是，它从未像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之际那样被粗鲁地玩来耍去。它使社会思想死去，使社会运动和公共生活的士气受挫。而且，它是一个谎言，是统治精英们的最大谎言。世界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社会决策不再由大多数人决定，而完全由那些在特殊社会体系中的少数行动者决定。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现在人类比过去拥有更大的可能性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些从现实社会中获利的人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希望确保 能够牢牢控制社会现状的人他们希望所有其他人视他们的特权为“自然的”、永恒的。在我看来，民主党人的使命特别是民主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撕去这种权力的面纱，并且设法使社会决策和权力行使尽可能的文明和平等。

因为本书直接阐述的是媒介与民主的关系，所以，准确地表达“民主”概念也许是明智之举。我们这个社会最令人振奋的时代特征之一，就是民主受到所有人的拥护，顽固分子、狂热症者和惧外症者除外。这是相对晚近才发展起来的状况。民主的再度流行要归功于人类过去数个世纪的摸索，但是，这个概念被使用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已经失去了很多特征和意义，这样，只要是范围广泛的人消费某种“产品”都叫做“民主”。的确，“民主”这个术语似乎适合于描述任何良好的事情或行为，而像“法西斯主义”或“希特勒之流”这类词语则常常被用来描述消极行为，不管它们与第三帝国或法西斯政治的真实关系是什么。

所以，当美国被冠以民主社会之时，它所蕴涵的意义与人们的价值判断和想象相距甚远。但是，如果我们概而论之，美国被冠以民主社会之名则意味着，在美国，公民享有个人权利和自由，包括选举中的投票自由；它也意味着武断的政府权力受到宪法、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制

约。但是，美国民主观念明显缺少与民主密切相关的东西，即一种多数人决定的观念。事实上，很少有人会认为，美国已经偏离了民主意义上的民主社会。然而，很多关键性决策是由大公司决定的，多数由政府决定的决策受到特殊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影响，而这些集团却很少具有公共意识。

艾伦• M • 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指出，美国或全世界的民主最好把它叫做自由主义。正如他所言，自由主义运动在欧洲的发展目的是保护封建领主的权利免遭专制君主的侵犯。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自由主义演变成一套重要的原则来保护私有财产免遭国家的侵犯，特别是国家在受到无产者多数控制的情况下。因此，在今天的美国，一些人把民主首先看作是个人买卖财产的自由和经营投资的自由。这些自由与民主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之间还有一些区别，它们被按照不同的种类予以类分。这种将市场权利等同于政治自由、资本主义等同于民主的谬论，显然是不证自明的。本世纪很多国家已经实现了市场权利的保护，但是这些国家一方面保护市场自由权，另一方面却实行专制统治，对公民的自由权没有给予任何的尊重。

自由主义有很多值得赞扬的东西——如果没有自由，民主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事实是自由主义不同于民主。当民主被定义为自由主义的时候，多数统治的观念(这不是民主的核心和灵魂)就被弃置一边了。在当代美国社会，公民极少拥有控制政治决策的权利。在严格意义上，美国政治与政治寡头的区别是公民保留选举的投票权，因此能够将不称职者拉下马来，即使他们对在职官员没有多少控制权。自从选举变得有点琢磨不透——它们更像拍卖行里竞价高拍的商品，竞选辩论几乎总是回避核心问题，投票选举公职人员行为的重要决定多数情况下是不合适的——这样的民主投票权似乎没有多大价值。但是，在主流思想当中，投票权的存在是界定美国之所以为民主的主要标准。这种观点有点像“墙头草”，实在站不住脚。

当我使用民主这个术语的时候，我这里指的是古典意义上的民主，也即多数人统治。自由传统的民主内涵在得到保护的同时也得到扩张——诸如个人的公民自由权利以及制约国家的权利——但是，少数有产阶级的政治需求从未与公民的政治需求一致起来，或者说，从未与民主的基础相一致。像美国这样的社会，到处密漫着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少数民众参与决策和普遍





的政治疏离现象共存，这绝对不能被当作是民主制度。当我讨论美国社会“民主化”时，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建立能够实现多数人统治的机制。这也意味着，在其他方面，我会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建立服务全体民众、促进民主治理的媒介体系。在结构方面，它意味着媒介体系中包含着非盈利和非商业化的成分。

本书的主题之一是要说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兴起是促使媒介大范围联合和民主政治生活崩溃的主要原因。新自由主义主张采取市场作用和利益的最大化、非市场制度作用的最小化政策。新自由主义提倡的放松规制原则，在允许媒体联合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新自由主义还是一套政治理论，它假定，在经济统治一切、政府“干预”经济尽可能少的情况下，社会运作才能达到最佳。简言之，新自由主义民主就是那种政治机构控制少、辩论甚至更少的制度。在这种社会，政治冷漠和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是公民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和上中层的公民的必然选择。

新自由主义政策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总统与撒切尔夫人是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在过去 20 年里，新自由主义成为一个全球现象。但是，这一现象正在全面误导目前的新自由主义。事实上，由少数富人控制民主的欲求先于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且这种欲求从古至今贯穿于整个美国历史。在美国革命时期，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提倡给予成年男子以选举权。他们的对手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约翰•杰伊(John Jay)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反对对财产拥有者进行选举权的限制，并且认为以这种方式建立的政府，目的是要削减人民统治的可能性。杰伊和亚当斯在这方面的表达可以说最为精彩，他们认为，“管理国家之事应当由拥有这个国家的人来进行。”在宪法辩论期间，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认为，政府的目标必须是“保护富有的少数人来反对贫穷的多数。”简单地讲，民主的本质和属性总是不平等社会里竞争性集团之间冲突与斗争的结果。新自由主义主要反映这样的思想，即少数人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因此他们能够将自己的意愿形成为屈服的、无组织群众的意愿。

在本书中，我想阐述的媒体一民主的悖论有两个组成部分。首先，这个悖论是一个政治危机。我在两个层面上表明这个意思。一方面，我们的联合性商业媒介体系的本质危及我们的政



治和文化，另一方面，关键的问题是：谁控制媒介体系、媒介体系的目的是什么，无法成为当代政治争论的一部分。相反，有人却认为，追逐利润、商业化的媒介体系压根就没错；多数问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国家低度介入或规制予以解决，因为这些方法从理论讲将会带来“竞争”这个“万能药”。考虑到媒介和传播在我们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我相信，媒体如何控制、如何建构和资助媒体问题应该成为民主辩论的中心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却无影无踪。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它首先反映了媒体联合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而且，它已经勾画出联合媒体挑战者和传播民主化的前景，这个前景更加令人担忧。

媒体一民主悖论的第二个部分的内容是有关媒体意识形态的，特别是那些联合媒体的管理者和它们的支持者，在利用历史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处不在的、自我保护的姿态。联合媒介体系的本质和关于这个问题的民主辩论的缺乏经常受到保护，这种保护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的：通讯市场强迫媒介公司“给人民想要的东西”；商业媒体是天生的民主和“美国人的”体系；新闻职业精神是民主的，它保护公众免遭新闻中邪恶力量的影响；新的通讯技术天生就是民主的，因为它们削弱了商业媒体的现存权力；也许，最重要的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授权公司和广告商在不受公众干预的情况下治理美国媒体。这些基础通常情况下是真实的，而且历史总是被用来为每一个原则提供佐证。总体看来，这些原则在美国历史上摇摆不定，甚至在那些对社会秩序不满的批评家那里也是如此。这是因为这些神话的能量——它们要么是彻底的谎言要么是半真半假——剥夺了公民了解和管理自我生活的能力，我在本书的副标题中把这称做“不确定”的时代。

我将本书分为两大部分，每部分均由三章构成。第一章回顾 21 世纪初美国媒体发展的主要趋势。我以编年史的结构形式描述媒体工业和它的主要特性；同时，我考察作为一项原则的公共机构的衰落以及对媒体问题公共辩论的全面堕落。在第二章里，我放大了分析范围，从美国的分析扩大到世界。虽然本书的内容主要与美国有关，但是，过去数十年的一个主要趋势已经形成，那就是几十个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商业媒介市场。如果谁要想理解媒介体系的本质和媒介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他就必须理解这种趋势的发展过程。在第三章，我考察了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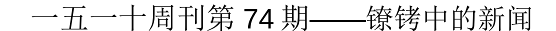
联网和数字革命，并且分析了它们是否会破坏联合媒体的计划。在我看来，关于互联网未来的多数分析受到它的发展趋势的影响，因此，表现出相当大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把互联网看作是独一无二的、无法超越的新事物，而不是把它看作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和联合媒体与通讯体系的逻辑扩张的结果。当我们从后一种意义上来看待互联网时，我认为，"赛博空间"的未来似乎注定不会有多少神秘、浪漫、民主和革命色彩。

书的第一部分几乎全部根据 1997 年到 1998 年经济和商业出版文献完成。现在，这些文献是美国发生变化的惟一见证，全球媒体和通讯体系有详细的记载。这些经济和商业报告有些方面写得相当好，因为当它们瞄准投资者时，就会注重可靠的信息和理性的思考。但是，这些说明报告除了公共关系之外，全部缺乏关注社会关系或这些发展趋势的重要性。我把自己想象为一位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通过这种专业转换形成对当代事件的看法，用乔治•卢卡克斯(Georg Lukacs)的话讲，就是"把现实当作历史"。同时，我也试图想弄清楚是什么力量左右这些经济和商业研究和分析的，它的政治价值是什么。此外，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撇开经济和商业出版物，依靠某些证据来支持观点。作家必须沉浸于经济和商业文本之中，把它作为建立学术观点的基础。在我的处女作中，我曾经广泛地使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商业广播发展史材料；当我开始着手撰写第二和第三本书时，从 1994 年开始，我就阅读了 大量的经济和商业出版物。有了这个经历，我相信我有能力评价商业出版物的价值：什么时候值得认真对待，它们的有效性什么时候应当打折扣。

按照学术标准，前面三章的风格与传统是不相符的。对一位学者来说，任何情况下准确地记载目前发生的事件是非常困难的。当他分析局面混杂的对象如媒体的时候——在有些方面，整个体系在我们面前正在发生急剧的变革——困难的程度明显地增加了。不像传统的历史，作家能够花费所有的时间从事研究并且周密地论证某个观点，在前面三章，我所尽力做的就象是在严格规定的时间内"射击迅速移动的靶子"。那么，谨慎的办法是回避任何规范性评论，采取中间立场，并且只指出那些若干年后学者们可能会理解更深、评论更透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种办法对于我书中想要表达的问题的本质是不合适的。当我们对正在发生的数字媒体的准确发展轮廓无法预测时，有些媒介体系的发展趋势是十分清楚的，它们只有适应目前迅速变化的状







况，否则它们的情况会更加恶化。例如，我所关心的新闻堕落(民主意义上的)和商业媒体对儿童的地毯式“轰炸”(文化意义上的)问题，可能会被认为，我这是在无事生非，但是，至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来否定我的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因此，我有义务在书中坦陈事实。当我发现存在着令人信服的证据，但却与我的主题不相一致时，我也将它收入文本，并且补充到论点中去。在最后的分析中，我极力遵循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的忠告：“历史学家应当是一个怀疑论者、一个侦探、一个诚实的人。”

前三章的叙述性材料是最新的，而且是没几个月就要修订一次，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在成书的数年当中，很多数据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予以更换。检验这几章内容的标准不是看它们如何很好地抓住了 20 世纪末这一瞬间，而是看当叙述性材料需要更新的时候，它们如何令人信服地支持总体框架、分析、观点、结论和建议。

第二部分也由三章组成，主要利用历史材料分析当代联合媒体如何利用意识形态来为自己的利益寻找辩辞的。在第四章里，我解构了支持联合媒体权力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的中心思想是联合商业媒介体系是美国制度的“自然的”部分。我考察了 20 世纪 30 年代公共广播电台运动史，特别观察了教育家在运动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认为电台和教育一样，不是“天生的”商业企业。在第五章中，我特别关注公共广播机构在历史上逐渐衰落的过程。这一章像第二章一样，涉及到很多美国之外的内容，因为公共广播机构地位的衰落在其他国家情况更加严重。第四和第五章有一些新的材料，它们扩大了我原先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范围。利用这些材料，我对这样一种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即认为公共广播的衰落是由于电子频谱资源短缺造成的，当这种资源短缺严重到一定程度时，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将所有的广播电台移交给私人经营。我整理了加拿大广播的政治运动史，它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成功地强迫政府建立公共广播机构，这不像美国，后者表现得犹犹豫豫。我认为，加拿大公共广播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这种开阔的民主视野之上的，并且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公共广播如果还有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这种视野是十分必要的。

第六章考察美国过去几十年媒介政策的一个主要发展方面：渐进的但却是无情的被篡改了的《第一修正案》(主要指新闻自由)，成为保护联合媒体的权力和财富的一个工具，同时，它





也成为限制美国民主发展可能性的一个障碍性工具。这不仅仅是一场由富人和有权有势者发起的运动，它已经得到很多来自自由党人和温和的自由论者的强烈支持。所以，纳特•亨特夫(Nat Hentoff)不惜用去大量时间，谴责那些希望控制政治竞选开支以及希望商业电台能够成为那些最应受谴责的盲信者和狂热分子的人。像亨特夫这样公认的"进步主义者"和"民主党人"，他们也接受了媒体这种新的、心平气和的联合行为，我认为，对《第一修正案》进行商业化的解释是在犯致命的错误。我相信，有一点是非常必要的，那就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这样的利益集团——曾经率先为政治民主而战——应当回到民主的本质问题上去，以此断定，《第一修正案》不可能既保护公司的特权和财富，又同时保护和促进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

第七章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再一次阐明一个贯穿始终的观点：制订媒体的结构性改革方案需要政治的组织化运动。我认为，如果美国计划更好地完善它的媒介体系，需要出现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民主左派，它将媒体改革作为自己政治纲领的一个核心内容。因此，结论集中在：为什么左派对扩大民主是必要的；为什么预期中的美国民主左派需要比它的前辈更好地理解媒介改革的重要性。在书中，我也回顾了左派媒体行动主义的简要历史，同时设想了值得注意的媒体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方案。20 世纪 90 年代末，世界反新自由主义左派的媒体行动主义的兴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结论就是根据整理这一时期的历史推导而出。最后，本书是献给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的媒体行动主义运动的。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传播学研究所教授。译者谢岳，政治学博士、教授。原文系《富媒体穷民主》导言。原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444.html ）

【返回目录】

v



【FMN 新闻】

哈尔滨塌桥事故

中国媒体报道， 8 月 24 日 5 时 30 分左右，通车不到一年的**哈尔滨阳明滩大桥**引桥发生断裂，4 辆大货车坠桥，目前已造成 3 人死亡、5 人受伤。不过事故第二天，哈尔滨表示，事故地点是三环路高架桥进入群力高架主桥的一小段匝桥，而非阳明滩跨江桥。

新闻：http://fmn.cc/QVQvth

http://fmn.cc/QVQRAl

当日正好安监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通车不到一年就发生塌桥事故，大桥肯定有质量问题。不过**哈尔滨**政府并不这么认为，该市新闻发言人称， “初步怀疑因车辆超载”导致塌桥。

新闻：http://fmn.cc/MPOPp9

http://fmn.cc/RIfOGg

在**哈尔滨**澄清事故发生地点之前，这座被誉为奇迹的阳明滩大桥成为了全国的焦点，有关其建造背景被悉数挖出。当地媒体曾赞扬称， “市民无需担心阳明滩大桥质量” 。这座原计划工期为三年的大桥，哈尔滨市建委只用了 18 个月，以“五加二、白加黑”的工作作风就将其建成，创造了省内超大型跨江桥梁施工最快速度。

新闻：http://fmn.cc/QVR9XJ

http://fmn.cc/Q3mz1Z

同时，**阳明滩大桥**建造过程中，工人 24 小时不停歇赶进度，大桥的工程监理由没有悬索桥监



理经验的公司中标，事故发生后哈市对人民网称由于工程指挥部解散，无法查询到是哪家单位负责的事故段桥梁等等，加之本月发生的多起路面塌陷事故，人们对哈尔滨市发出了质疑的声音。

新闻：http://fmn.cc/NKHVmB

http://fmn.cc/QVTFgI

对于导致引桥断裂的事故原因，**哈尔滨**和中国安监总局都仍在调查中，不过就在 24 日哈尔滨市政府秘书长黄玉生给出了"车辆超载"的判断后，还有一些桥梁专家也对媒体表示，"初步判断，超载是桥塌主要原因和最直接原因。"25 日下午，哈尔滨还表示，坠桥的 4 台卡车总重超过 400 吨，不过死伤者的家属却不能接受这一说法。

新闻：http://fmn.cc/NM3hjp

http://fmn.cc/U2ULf7

http://fmn.cc/QVTv95

人民网 8 月 24 日晚报道称，事故发生后，他们试图查询断裂桥梁部分的施工单位信息，但**哈尔滨市建委**表示，因为阳明滩大桥施工指挥部已经解散，所以无法查询到是哪家单位负责的这段事故桥梁。不过这一情况遭到哈市政府的否认，但却依旧没有给出事故路段的相关信息，只说要等到以后一同向社会公布。

新闻：http://fmn.cc/U2ULf7

http://fmn.cc/NM3mDF

http://fmn.cc/RLhUFn

哈尔滨的发布会上将三环路群力高架桥垮塌事故定性为"侧滑"引发媒体批评，并直言不讳的指出"言下之意，塌桥归塌桥，鲁班奖还是鲁班奖"。人民网也发文称当初市建委称找不到施工单位，后又否认是在辩解。还有媒体找到事故桥的监理方——黑龙江百信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该公司副总承认是监理方，但拒绝回应大桥的工程质量和事故原因等问题。



新闻：http://fmn.cc/U2L7ZH

http://fmn.cc/U2UM2H

哈尔滨方面曾表示，有国家级桥梁设计大师和知名专家 7 人，组成专家鉴定组来哈进行鉴定。25 日上午已经有 4 名国家级专家到现场进行了初步查勘。不过东方卫视表示，26 日上午，7 名专家到哈尔滨塌桥现场仅勘察半小时就离开了。

新闻：http://fmn.cc/Nwx0fk

http://fmn.cc/U2L7ZH

塌桥事故发生的第四天，**哈尔滨**才公布了事故桥的施工单位和监理公司。据悉，匝道工程设计单位为哈尔滨市市政工程设计院，资质为市政行业甲级；施工单位为福建省交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资质为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监理单位为黑龙江百信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资质为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同时有媒体调查指出，另四对匝道可能存相同隐患。

新闻：http://fmn.cc/SL62B4

http://fmn.cc/NVK5zT

本周重大事故和疫情

8 月 26 日凌晨 2 时许，**陕西省延安市**境内的包茂高速公路上，一辆双层卧铺客车和一辆罐车(装有甲醇)追尾，并致两车起火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发生事故的客车核载 39 人，实载 39 人。事故发生后导致 36 人死亡，仅有 3 人逃生。

新闻：http://fmn.cc/QVM4yA

8 月 26 日下午 13 时 43 分，一辆无牌面包车在行驶至沪蓉高速**广安**段 1714 公里加 400 米处时，与一辆车牌为川 S39789 的大型货车发生追尾交通事故，事故最终造成面包车上 12 人全部



死亡，其中包括 7 名未成年人。

新闻：http://fmn.cc/QVJHMt

http://fmn.cc/Ohi8yL

8 月 27 日 27 日凌晨 4 时 30 分许，吴靖高速**绥德**段 G20 上行线 1097 公里+ 480 米处，发生一起 4 车连环追尾事故，致一丰田面包车乘坐的 9 人全部死亡。

新闻：http://fmn.cc/QVKRr9

8 月 27 日 14 时 54 分，**广东英德市**望埠镇龙山采石厂矿区发生炸药爆炸事故，爆炸时方圆数里都感觉到强烈的震动，房屋有明显晃动截至目前，事故最终造成 10 人死亡，英德市也采取了救援行动。

新闻：http://fmn.cc/QVJSav

8 月 29 日 18 时左右，**攀枝花市**西区正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肖家湾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截至 30 日 8 时 28 分最新消息，井下又发现 4 名遇难者遗体，至此，事故已共计造成 19 人遇难，仍有 28 人被困井下。

新闻：http://fmn.cc/QVMqFu

http://fmn.cc/QABZwv

8 月 23 日下午**湖南株洲市**天元区瀚水栗源小区很多居民购买了该小区门口出售的牛肉，部分吃过这种牛肉的居民出现恶心等身体不适症状。至 24 日 19 时许，有 17 人在医院留观检查，没有生命危险。不过有多位人士证实，湖南省对这一事件的报道进行了压制。

新闻：http://fmn.cc/SCzhpC

http://fmn.cc/SCvxo2

8 月 23 日 17 时 24 分，**佳木斯**火车站两列旅客列车发生事故，造成 24 名未来得及下车的旅客

摔伤。哈尔滨铁路局的消息称，事故是由于两车车厢在连接过程中由于连挂冲动较大造成的。
新闻：http://fmn.cc/QVKMUi

中日关系热点新闻

中国**山东省日照市** 25 日发生反日游行，游行者可能约有千人，主张中国对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拥有主权。一些游行者袭击了日本料理店并砸坏了店门玻璃。期间人们不断呼喊口号并焚烧了日本国旗，这也是连续第二周有城市爆发反日游行。
新闻：http://fmn.cc/U2JNGe
视频：http://fmn.cc/U2MGHg

日本驻华大使馆称，**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乘坐的汽车 27 日在北京市内遭到疑似中国籍男子的袭击，插在车上的日本国旗被夺走据悉是丹羽宇一郎乘坐的汽车在北京环路行驶时，遭到两辆汽车围堵，一名男子下车把大使乘坐的汽车前方插着的日本国旗抢走并离开。大使毫发无伤。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严正抗议，要求中国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并对本次事件进行搜查取证。
新闻：http://fmn.cc/QVLAZx
http://fmn.cc/NrQ0g0

近日中日关系出现波动，**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计划近期亲笔致信中方领导人，就近期因钓鱼岛争端出现的两国关系紧张局势呼吁双方冷静对待，并将再次确认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性。
新闻：http://fmn.cc/QVORIl

由于驻华大使车辆遭袭，日驻华使馆再次提醒在华日本人，要在公众场合注意言行和态度。同

日还有一名**中国**女子向日本大使馆投掷塑料瓶，随后被警方带离现场。

新闻：http://fmn.cc/QrzigJ

http://fmn.cc/QrzqwT

就中日关于钓鱼岛的纷争，有记者在**美国国务院**记者会上进行提问，发言人纽兰 28 日回应称，对于中国称为“钓鱼岛”并与日本有主权之争的尖阁诸岛，美国政府目前在官方名称上采用日语读音，不过她也重申美方在主权上“不持特定立场”的一贯态度。

新闻：http://fmn.cc/PPCNtA

日前遭遇袭车夺旗事件的**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 29 日在中国社科院举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纪念研讨会上致辞，呼吁中日之间加强沟通。一同出席会议的中国前国务委员唐家璇也谴责袭车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不是爱国之举。他表示，中方正在进行彻底调查。

新闻：http://fmn.cc/RXPibZ

http://fmn.cc/PPCPlj

中国官员相关新闻

近日网络上又出现关于**凤城市委书记**王国强卷款 2 亿元并擅自历经逃至美国的消息并引发关注，传言发生 3 个多月官方也没有具体处理结果公布，凤城市的相关工作自四月起已由原市长马延春接管，27 日凤城发布消息称辽宁省委于 8 月 14 日决定，任命凤城市长马延春为市委书记。

新闻：http://fmn.cc/NyF3Uf

http://fmn.cc/QLVJrv

8 月 28 日东北新闻网报道称，近日网上传言“辽宁**凤城原市委书记**王国强卷款 2 亿多元离境”一事，辽宁方面证实事件属实，并表示王国强因涉嫌经济犯罪检察机关已经对其立案并启动追

逃程序，本月 15 日辽宁纪委将王国强双开。

新闻：http://fmn.cc/SM2EXW

8·26 特大交通事故处理现场，一名官员微笑的场景被定格，网友发现他是**陕西安监局长**杨达才，更翻出他在不同场合佩戴多块名表，有人士表示若这些表全为真品则价值不菲。杨达才因此出面和网友交流，称是现场事故重大，神情比较轻松被外界放大。他也承认五块表全部价值上万元，但关于他的收入和其他几块新被找出的表他没有作出解释。

新闻：http://fmn.cc/SL0iqZ

http://fmn.cc/RoBVeo

8 月 29 日下午，合肥飞往广州的南航 CZ3874 次航班上，一名叫@花 Money 买毛豆 的南航空姐发微博诉说自己被机上一对夫妻辱骂并殴打的事件，她还配发了多张被打伤的照片。事后空姐获知打人者是**广州越秀区委常委**、区人民武装部政委方大国。方政委甚至叫来军车威胁空姐要求和解此事。

新闻：http://fmn.cc/O4sNfD

8 月 29 日早上有媒体人士传言**前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被双规，并和秘书跳楼自杀，引起了关注，不过据财新网的消息，张广宁及其秘书目前安好，工作生活均处于正常状态。

新闻：http://fmn.cc/PqRjYn

据广州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广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何靖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且有数名派出所所长牵涉其中。何靖也是近年来广州公安系统”落马”最高级别的官员。另外，广东**湛江市霞山区**区委书记梁必志因收受贿赂、贪污公款、多次嫖娼等违法违纪事实，被广东省纪委查处，并已被双开。

新闻：http://fmn.cc/QBkqwx

http://fmn.cc/Pq7u8n



现任**霞浦县**松城街道办事处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主任游某震，因涉嫌强奸幼女罪于 8 月 19 日被霞浦县刑警二大队刑拘。游某震今年 39 岁，而他是当地街道办事处党政办主任、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主任。主管的还是城市按摩店、色情业治安维稳工作。

新闻：http://fmn.cc/OnGmJN

8 月 28 日，河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网站上通报称，今年 6 月 18 日发生在**淮阳县**的花炮厂爆炸事故中，当地政府通报死亡 7 人伤 14 人，但实际死亡人数多达 28 人，并有 20 人受伤，由于群众的举报，河南省本月才查清了事实情况，目前瞒报的领导已被停职。

新闻：http://fmn.cc/NVIudm

本周其他重点新闻

23 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被曝跳楼自杀不幸去世，人民网也证实称，“经人民网编辑向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有关负责人了解，该部编辑徐怀谦 8 月 22 日下午 1 点 25 分左右从家中坠楼，经北京朝阳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终年 44 岁。徐怀谦因患抑郁症病休，曾到北京安定医院治疗。报社同事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十分悲痛。”

新闻：http://fmn.cc/Pyj1Fm

天涯焦作版版主“焦作退伍兵”因关注**焦作** 8·7 车祸家属求助的消息，并记录了家属到市政府讨说法的情况，不仅被警方约谈警告，更在 14 日被秘密抓获并被刑事拘留。8 月 23 日，河南焦作警方回应称，该网友被拘因为组织死者家属冲击焦作市政府，“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目前“因认罪态度好被取保候审”。另两名被传唤网友在“进行批评教育后”已经释放。

新闻：http://fmn.cc/MPOwdV



http://fmn.cc/R5lyU0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起草了一份有关刑讼法执行的意见征求稿，但并没有向外界公布意见稿的内容也没有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可对报道庭审情况以及违反法庭秩序的律师进行惩戒的规定。律师们普遍认为存在“越权”的嫌疑。对于最高法起草的司法解释仅在内部征求意见的情况，不少律师提出应该全面公布，由社会各界进行公开讨论。

新闻：http://fmn.cc/RIly2Q

邵阳 27 日上午发生一起自来水公司纵火案，因职工石燕飞不满子女就业安置，在该公司党组成员开会时，放火烧死 3 名党组成员并烧伤 4 人，纵火者石燕飞跳楼后于 30 日上午不治身亡。

新闻：http://fmn.cc/0nG5q2

http://fmn.cc/QBiUdP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上，**光明乳业**总裁抱怨道，“国家去年抽查光明乳业 4553 次 ，这么抽查会抽死人”，他还认为国外奶品出事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奶好。上海质监对此回应称，三聚氰胺事件后，对光明乳业一年抽检 4533 次不为过。

新闻：http://fmn.cc/NQmlNo

http://fmn.cc/PPC6AL

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国际航空） 8 月 29 日晚间通过官微发公告称，由于收到了 CA981 航班受到威胁的信息，为了确保旅客的安全，该航班已返航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机上乘客则表示，国航没有告知他们返航的原因。当晚飞机在机场经排查后没有发现异常，换机后飞往纽约。

新闻：http://fmn.cc/MZy4rE

http://fmn.cc/QVIJj6



8 月 27 日上午 200 余名来自全省各地的艾滋病患者聚集到**河南省政府**门前，要求政府进一步落实艾滋病救治帮扶政策，提高对艾滋病患者的救治帮扶标准。BBC 的消息则称上访者在要求进入省政府时被阻拦，同警方发生了冲突并被殴打。

新闻：http://fmn.cc/Ri4w51

http://fmn.cc/SLaBvd

由学者于建嵘发起的“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的活动”曾引发全民参与，**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近日通过官方微博表示，自这一网民自发行动开展以来，被拍的基本没有被拐儿童，建议“发起人一定要谨慎从事，不能让爱心廉价支付，更不能让无辜者心灵受伤。社会需要爱心，同样也需要尊重。”

新闻：http://fmn.cc/PqRgMg

山东**经济观察报社**因被控连续刊发虚假失实报道，被山东省新闻出版局给予警告、罚款 3 万元的行政处罚，并吊销编造虚假记者的证件，还对编写报道的记者进行警告，并要求该社纠正“违规行为”。

新闻：http://fmn.cc/MZub6a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和个人陈述（说明希望加入志愿者团队的原因）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1510weekly）

编辑：丁昕、刘垚、曾维琪

校订：方宜农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潘雯怡

技术支持：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杜婷

